

本书首先以中文出版

费德林回忆录

Николай Т. ФЕДОРЕНКО 【俄】尼·费德林 著

我所接触的 中苏领导人

КИТАЙ: ВРЕМЯ И СУДЬБЫ

新 华 出 版 社



D822.35/2

1

92330

费德林回忆录

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

〔俄〕尼·费德林 著

周爱琦 译

新华出版社

(京)新登字 1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费德林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俄）费德林
（Федоренко，Н. Т.）著；周爱琦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 7

ISBN 7-5011-2873-1

I. 费… I. ①费…②周… II. 中苏关系—回忆录
N. D822.3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07509 号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1995 年 7 月第一版 1995 年 7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25 印张 120 千字

ISBN 7-5011-2873-1/D·483 定价：8.80 元

DH54/15

出 版 说 明

尼·费德林作为一名资深汉学家和外交家，亲身经历了中苏关系中的几个关键时刻。他作为外交官和中国问题专家以翻译身份参加了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历史性会见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并曾陪同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1958年，他又参加了赫鲁晓夫同毛泽东在北京的会晤。曾担任过代理苏联驻华大使的工作。费德林对中国问题，特别是中国文学的研究造诣很深，他撰写的《屈原的生平与创作》、《中国文学史概论》、《论鲁迅文学创作的特征》等著作达三四十种。此外，他还参加过俄文版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定稿工作。

中苏关系从友好到破裂，费德林是最直接的目击者和见证人。他的回忆录对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了解和研究这段历史颇有参考价值。

由于作者所处的环境和地位，以及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文中有些印象、看法和观点难免与我们有所不同，如有关个人迷信，关于新思维等等。为了尊重作者，保持作品的完整性，对有关段落予以保留未作删节，相信读者是会加以鉴别和判断的。

序 言

何修權

费德林院士是我的老朋友，我们相识于40年代的峥嵘岁月。屈指算来，已越过半个世纪。当时，他风华正茂，仪表堂堂。多年来他留给我的印象是十分美好的。文革后，他重游北京，我们再度见面，彼此都是白发苍苍的老者了。但他的精神依然飞扬，思维依然敏捷，最主要的是，对中国热爱之情不减当年。他不愧为研究屈原的博士；他使我想起屈原的两句诗：“芬至今犹未沫”，“芳菲菲其弥章”。

我忘不了他一口流利的规范化汉语。他对中国的感情是根深蒂固的。中苏关系中断近30年，他的汉学研究从未中断。他是外交家，又是文学家，无论前者还是后者，他的工作中心始终离不开中国。

50年代，我在外交部负责苏联东欧事务，他是苏联驻华大使代办，我们既有私交，又有公务接触，他的正直赢得我的敬意。后来他担任驻联合国首席代表，为争取新中

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作不懈努力，厥功奇伟。

作为外交官，他一贯主张苏联外交政策应该东西方兼顾，犹如大鹏鸟的两只翅膀，一翼在东，一翼在西。东方，主要指中国和日本。

他也是中国文学的热爱者和研究家，从屈原到鲁迅，从郭沫若到艾青，都曾发表专著。

他的这本回忆录，是中苏关系一段真实的记载。事过境迁，年轻一代对此已知之不多。我们这一代人，有的已经、或即将随历史而逝去，但历史的记载会留下来，留给后人的是思考，也将由后人来对它进行评议。

岁月荏苒，想不到我们都八十多岁了。匆匆写此，祝愿我的老友费德林院士秉笔凌云，健康长寿！

1995年6月22日

关于作者……

1992年，当译者翻译本书之时，正值本书作者、著名汉学家费德林院士80高寿。这时的他，还经常兴致勃勃地奔走于莫斯科——北京、以及中国的各个城市之间，参加我国的各种学术研究会议，如饥似渴地研究着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他常说，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他爱中国……

是的，费德林的一生，是同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费德林的名字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凡是同前苏联有过交往或有过某种联系的人，恐怕鲜有不知其名的。他称得上是当前俄罗斯最资深的汉学家之一了。他同中国的关系，或者说，同中国的友谊，可追溯到30年代末。当时，他从莫斯科东方学院毕业不久，进入外交部门，派驻到苏联驻华使馆工作。在抗战时期的重庆，苏联使馆一方面同蒋介石国民党打交道，同时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同志密切联系。当时还不到30岁的费德林精力充沛、雄心勃勃，在从事外交工作的同时，出于对中国文学的浓厚兴趣，一头扎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海洋。

他广交朋友，结识了一批中国文化精英：郭沫若、夏衍、赵树理、茅盾、丁玲、曹靖华……他像孙悟空盗仙果一样，贪婪地吮吸着中国文化宝库中的丰富乳汁。他的两只眼睛一开始就瞄准了古代的屈原和现代的鲁迅，由此开始了他的研究工作。一个外国人，要去吞食那连许多中国人都啃不动的坚果——楚辞，该要有多大的勇气和毅力！

然而，他的研究成果一部接一部地在苏联出版了：《屈原的生平与创作》、《离骚》、《论鲁迅文学创作的特征》、《中国文学史概论》、《中国古典诗歌——唐诗》、《中国伟大的剧作家关汉卿》、《郭沫若》、《论中国的新兴文学》……研究一步步地深入，从楚辞、唐诗到现代诗歌，从中国古代神话到“诗经”、“易经”，从微观到宏观……无所不在他的著作范围之内，据他自己统计，不算各种长短文章，仅出书就有三四十种，用“著作等身”来形容他，也许不算过分。

苏联读者通过他的书认识了屈原，认识了鲁迅、郭沫若，认识了艾青……了解到历史悠久、蕴藏量深厚的中国文学遗产。

在学术研究取得累累成果的同时，他的仕途也一帆风顺。他在苏联驻华使馆从一般工作人员到文化参赞，直到代理大使工作，在中国一呆就是十几年，目睹了从国民党统治到新中国的转变。在解放后的中国，他在中苏关系中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50年代中期，他已由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升任为副部长了。

1949年，他作为苏方外交官和中国问题专家以翻译身份直接参加了毛泽东和斯大林在莫斯科的会晤，1958年又参加了赫鲁赫夫同毛泽东主席在北京的会晤。他是中苏关系从亲善到破裂的见证人。

遗憾的是，他对中国的深入研究因中苏关系的恶化而受到挫折。1958年，他调任苏联驻日大使，1963年起任驻联合国首席代表。这个阶段，他唯一感到安慰的是曾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做了积极的工作。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终于在他的任内得到解决。后来，1992年在北京的一次宴会上，他风趣地对敬酒的中国友人说，“早知有今天，我当初还应该加倍努力才对啊。”他透露，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原是莫洛托夫下达给他的硬任务，他为此不遗余力，可是后来，政治风向变了，他不得不顶着上面的压力继续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中苏关系破裂以及他在外交场中周旋期间，他也从未中断过对中国文学和中国诗歌的翻译和研究工作。他亲口对译者说，他对官场的兴趣远远不如汉学对他的吸引力大。所以，他在汉学方面的建树也大大超过了他作为外交官的声誉。他作为一位有成就的汉学家，被一些西方国家聘为特邀教授和名誉院士，如意大利米开朗琪罗艺术院院士，美国政治经济研究院和科学院院士，日本中国问题研究所名誉委员、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特邀教授等。

他是前苏联科学院院士和莫斯科东方研究所高级顾问，虽然年过八旬，至今仍笔耕不辍。

1991—1992年，译者旅俄时，曾多次到费德林老人的莫斯科寓所作客。在他那间不大的客厅里，到处透着中国气息：书架上摆满中文书籍；传统的中国红木家具；沏上一杯中国茶（他最喜欢的铁观音）；在一对栩栩如生的中国吉祥物——仙鹤瓷雕的注视下摆开“龙门阵”。这是一个地道的汉学家之家，在这种气氛下，谁能想到此刻是在莫斯科呢？

费德林讲着流利的北京话，从蒋介石、宋美龄谈到周恩来、郭沫若，从他的老朋友文怀沙、艾青谈到当代的王蒙、冯骥才，……各个时代的人物都在他生活中留下记录，他经历了从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直到叶利钦时代。他的脑海里有一活的资料库。

他感到欣慰的是，他终于等到了中苏关系的解冻，他于1988年回到久别了的中国，惊喜地发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已经大大变了样，曾经非常熟悉的北京城披上新装，变得不认识了，他渴望了解这一切变化。于是，他不顾年迈，争取一切机会到中国来，他应邀参加鲁迅和郭沫若的纪念活动，参加艾青的创作研究……。几年来，他的足迹遍及北京、南京、上海、武汉、广州、深圳。他写下了十万多字的访华观感。

他架设的友谊桥梁虽曾荆棘满途，现在终于坦坦荡荡。新时期的中俄关系展现出异常广阔的前景。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早已从外交岗位上退下来，但是对于他热爱的汉学，还在执著追求，他要奉献终身，永

不退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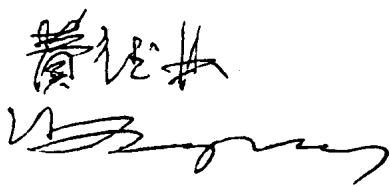
本书首先以中文出版，就算是对他 50 多年来孜孜不倦从事汉学研究的一份献礼吧。

周爱琦 1993 年 5 月 22 日于北京

目 录

序言	(1)
一、穿越西伯利亚	(6)
二、在专列上同毛泽东一席谈	(11)
三、斯大林和毛泽东：两巨头会见	(31)
四、斯大林 70 寿辰	(37)
五、谈判、签约	(41)
六、斯大林手下的亲信们	(54)
七、毛泽东举行告别宴会	(67)
八、我的顶头上司：莫洛托夫和葛罗米柯	(81)
九、在担任联合国常驻代表的日子里	(97)
十、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出版俄文版毛泽东选集	(105)
十一、我所看到的周恩来	(112)
十二、从友好到分裂：赫鲁晓夫北京之行	(133)
十三、通向中华之路	(155)

序 言



往事如烟，转眼间，这些记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这里包含着笔者对过去这些事件的思考。俗话说，记忆要对良心尽责。对于当时的情况，笔者不想粉饰，也无意抹黑，许多材料本身已说明问题。回忆的任务是实事求是。

生活中常有一些忘不了的人和事，它们一而再地浮现脑际，从而成为你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时，回顾往事是为了更切近地瞻望明天。我感到，过去的事常常同现在相联系。我们往往在记忆中找到某种同现时代，同现代思想合拍的东西。

我们经常谈论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相互联系……这种联系是多维的，然而有一点至关重要：揭露过去的错误有助于加强我们对现在和未来的信心。

流光难追，历史往事非人力所能主宰，更无法加以改变。但是人们应该了解它，了解其真相。回首前尘并非为了算老帐。对过去，对其精神价值的探究，是着眼于现在

和将来。过去无形地存在于现在之中。

未来不可知，我们的肉眼看不见，所谓预见，充其量不过是某种推测而已。然而，我们知道，过去和现在的许多东西将会进入未来，并成为未来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今天有不少东西正是来自昨天。

安娜·阿赫玛托娃^①在《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中形象地表达了各个时代之间的辩证关系：

过去孕育着未来的嫩芽，

未来闪烁着过去的余辉。

但是我们是否真的理解现在，理解眼前的事情了呢？未必。尽管涉及到生活中确实存在而不容置疑的事情。我们不一定明白其原委。因为……有时，它不过是某种不可逆转的事态的回音而已。

这本回忆录是为那些即将跨进 2000 年的现代人而写的。一些生活的片断，哪怕是苦涩的回忆，若不落笔成书，将永远在历史中消失，如过眼烟云，无影无踪。而当我独自守着一张张稿纸，又不能不考虑这些手稿的命运，这里所记录的事情可能被人忽视，也可能引起注意而留在读者的印象里。生命短促、时不待人。往事稍纵即逝，它将从我们闭锁的门前匆匆而过，它是不会叩门的。

我愿与本书读者一起跨越时间的代沟，使他们成为不久前那个动荡岁月中某些事件的见证者，使他们更好

^① 安娜·阿赫玛托娃(1889—1966)，苏联女诗人，卫国战争后曾一度遭批判，开除出苏联作协，1956年复出，诗集多次再版，在国内外颇受推崇。——译注

地理解事态的来龙去脉，以及今昔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了解过去难以期望将来，哪怕未来的蓝图是多么壮丽迷人。

不言而喻，我们许多人都是个人迷信和停滞时期的产物，这种制度为机关权势和官吏们创造了方便。他们无需多动脑筋，无需承担责任。制度创造了这样的条件：上面作出决定，下面照章执行。一旦出了问题，无法追究责任。其实责任者是有的，但是谁敢揭露掌握实权的上司呢？

人们不禁要问，难道那些年谁都没有发现这种政策会把我们国家引向何方吗？难道没有人觉察，我们正在失去一批批的国际朋友而日趋孤立吗？连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朋友都保不住了，更何况西方国家中与我们思想一致的人呢？他们搞不清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是怎么回事。我们自封为“各国人民的领袖”，能够治理管好社会主义阵营的秩序。比方说，“动一根手指头”就能让铁托永远滚出去。可是后来南斯拉夫又回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怀抱，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种情况难道仅仅限于一个南斯拉夫吗？

当然啰，现在批评过去很容易，特别是批评死去的人，死人已经不会开口。但是目前还有一些当年曾经参与其事的活人。他们担任过部长或有关部门的领导，是最高决策机构的全权代表，其中有的人获得过特别的奖赏和荣誉称号，他们为什么不能挺身出来对一些冒险行为和悲剧性的决策错误（如阿富汗问题）承担一部分责任呢？我们至今还不了解，活着的人中究竟谁应该对出兵这个

国家承担责任。还有一些人由于胆怯而不敢指出姓名，这难道符合公开性和民主的原则吗？那些曾经拜倒 in 个人迷信和停滞时期的领导人脚下的人，现在难道不应该出来反省一下吗？

还有一些人，我坦率地说，是以意识形态为幌子，干着营私的勾当，他们生怕丢掉自己的乌纱帽。什么意识形态？无非是名利场、官位学，力求在特权者的大馅饼中分到自己的一份罢了。

我们看人常常是根据他们的服装和面具。人的真面目隐没在服饰和妆粉之内。他们的服装表达着他们个人的趣味和追求。一些人以此掩饰自己的缺点，另一些人则靠它装模作样。总而言之，人们都裹着一层伪装，好像躺在丝茧中的小螟虫。

寒来暑往，流光易逝，当时我因偶然的机遇置身于斯大林毛泽东这一历史性会见的光束之下，那些值得纪念的日日夜夜离开我们这代人越来越远了。可是我却依然背负着十字架，记忆一遍又一遍地把我带回到那些遥远的岁月，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公开性抹掉了“白”与“黑”、左与右的界限。出现了新的视野。长期来，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会见从未公开披露过。参加过那次会见的人目前在世的已经屈指可数。不错，当时的许多感受同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时间的长河渐渐去粗存精，把泥沙冲刷，使主要的东西突现出来。每当晚上掀开记忆的帘幕，往事像过电影一样来到我眼前，不知不觉带上诱人的色彩。哦，这一切已经进入我的生活，

无法驱除。它是不能付之一炬的。是的，它是一笔深埋于窖底的财富。是公开性让大家睁开眼睛，把一切公诸于众。

哦，趁着现在一息尚存，我要把自己的回忆写下来。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人生苦短，未必能等到 21 世纪再来说话了。

时间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要非常准确地叙述某些细节已经不那么容易了。当然，细节可多可少，不是最主要的东西。但是细节和人们当时的举止表现非常说明问题，人们可以据此得出准确而有说服力的判断。小事情只是在初看时才觉得没有多大意思。

近日发现，许多过去被认为已经失散的文件和材料都散落在各种档案库里，总有一天，以往我们不甚了解的东西会重见天日并得到新的阐述。

1989 年 7 月 19 日